

# 中国城市建设档案 事业简史

■ 李忠谋 王淑珍 姜中桥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中国城市建设档案事业简史

李忠谋 王淑珍 姜中桥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城市建设档案事业简史/李忠谋等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5  
ISBN 7-112-07684-6

I. 中... II. 李... III. 城市建设—档案工作—文  
化史—中国 IV. G27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86075 号

责任编辑:陈小力

责任设计:郑秋菊

责任校对:李志瑛 刘 梅

**中国城市建设档案事业简史**

李忠谋 王淑珍 姜中桥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

\*

开本:787×960 毫米 1/16 印张:8½ 字数:170 千字

2005 年 8 月第一版 200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册 定价:18.00 元

ISBN 7-112-07684-6

(13638)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本社网址:<http://www.china-abp.com.cn>

网上书店:<http://www.china-building.com.cn>

## 序

我国城市建设档案工作是 20 世纪下半叶伴随着国家建设和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突飞猛进的城市建设而产生的一项新兴事业,它经历了 20 世纪 50、60 年代的初创,80、90 年代的迅速发展,很快形成了全国规模的管理体系,成为我国档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城市建设走向科学管理的重要标志。随着高科技和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渗透,城建档案工作从 90 年代末开始向现代化管理迈进。跨入新世纪,“数字城建档案馆”已成为城建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的目标和宏伟蓝图。

城建档案馆的出现是城建档案事业崛起和发展的标志,但不能说有了城建档案馆才有了城建档案工作。新中国的城建档案工作,应该说从 1953 年国家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城市建设也随之发展即已开始。毛泽东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还作过具体指示:“一个城市的设计资料,也应统一由城市建设总局管”。1959 年在华北东北协作区技术档案工作大连会议上,国家档案局局长曾三就曾建议把全国城市基本建设档案工作建立起来。此后,在 1961~1964 年间国务院又相继发文要求建立和加强城市基本建设档案工作,并在全 42 个城市试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 年国务院批转《关于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工作会议的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大中城市要以城市为单位,由市人民政府主管城建工作的领导人主持,由市建委或城建规划部门成立城市基建档案馆,集中统一管理城市基建档案。”国家档案局和城市建设主管部门抓住机遇,1981~1983 年连续三年召开了三个关于城建档案工作的座谈会,对这项事业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此后,城建档案馆在全国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

纵观城建档案工作的发展历史,不难看出,是改革开放和城市建设的飞速

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广大城建档案工作者高昂的工作热情和无私奉献精神,使城建档案事业生机勃勃,发展速度令人惊叹。一切新生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城市建设的综合性、复杂性决定了城建档案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与各行各业都打交道,总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也无法回避前进道路上种种令人困惑和忧虑的现象,这些也都始终伴随着城建档案事业发展的历程。但是,城建档案与城市建设的密切关系和在城市建设中的作用,是其存在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原因。所以,无论有什么样的困难和障碍,都不能阻止其持续发展的步伐。

在这里,我想谈谈城建档案的管理问题。1980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告诫城建部门说:“所有的管线档案,无论如何要搞几份,规划局存一份,每个建设单位存一份,各个专业局存一份,这样将来一旦有事,可以马上查找,节省很多人力、物力。”这里实际上涉及城建档案管理的一个指导思想,就是要求重要的城建档案(管线档案)必须有多套(几份),多套(份)档案必须分别存放,以便日后使用(将来一旦有事)。在国家有关部门发布的关于城建档案特别是竣工图管理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中都反映了这个指导思想。这个多套分存的思想,在天灾(地震、海啸、水灾、火灾等)、人祸(战争、恐怖袭击)不断出现的今天,更显重要,意义深远。其实,多套分存的思想也适用于一切重要的、珍贵的档案管理。20世纪70年代唐山大地震后,中共唐山市委分管档案工作的副秘书长在总结经验教训时说:“我们还有一个深刻体会,凡属重要档案资料,必须实行多套、分库保管的制度。”考虑到当前国内外形势和经济、技术条件,分别存放的距离还可适当扩大。目前我国城建档案分存的距离大多在几公里、一二十公里以内,似乎近了些。据我了解,世界银行集团档案馆(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世界银行大厦内)最重要档案的原件或副本,存放在400公里外远离军事、国防重地的一个旧石灰石矿井内(由一家称为“国家地下库”的公司管理)。这样的距离和安全条件,估计在我国目前难以达到。设想各城建档案馆之间互相代存一些特别重要的城建档案副本,以解决分存距离过近的问题。总之,我们应有忧患意识,做到防患于未然。

城市中创立城市建设档案馆并在全中国大中城市普遍设立城市建设档案

馆,是中国档案事业的一大特色。它已受到国际档案界的关注和重视,国际档案界知名人士、英国利物浦大学的迈克尔·库克博士作过这样的评价:“中国城建档案馆的崛起和发展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是无可比拟的,这是一个充满发展潜力的领域,可能导致理论和实践的巨大变革。”我们有理由为之骄傲,我们有责任总结我国城建档案事业的历史。《中国城建档案事业发展简史》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件事做得很有意义。该书是对广大城建档案工作者和研究者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探索的概括,对中国特色档案事业的繁荣发展和档案学研究是一项重要贡献。

陈兆祺

2005 年春

---

**陈兆祺**

我国现代档案知名学者、教授,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副院长,现任中国老教授协会档案与文秘专业委员会主任。

## 前 言

《中国城市建设档案事业简史》是一本阐述我国城市建设档案工作产生、演进、发展,直至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专业档案管理系统的专著。旨在探索我国城建档案事业创建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以期总结历史上的、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丰富实践与理论创新的经验,为城建档案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化城市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2000 年上半年,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城建档案信息专业委员会成立《城市建设档案工作五十年回顾》课题组,着手搜集资料,拟订纲目,开始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建档案工作开展系统的研讨,其成果自 2001 年起在《城建档案》杂志上连续刊出。之后,在《回顾》的基础上,又向前延伸和扩充,遂编纂成这本《简史》。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各地城建档案同仁的支持与帮助。江苏省建设档案馆提供了所编写的《江苏省建设档案志》(讨论稿),南京、包头、成都、郑州、杭州、青岛、大连、上海等市城建档案馆提供了有关资料,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著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疏漏,诚请读者和有关专家批评指正。

该书由深圳市档案局资助出版,特在此代表全国城建档案同仁致谢。

编著者

2005 年 2 月

# 目 录

序

前言

|                           |    |
|---------------------------|----|
| 第一章 城市的演进与城市建设档案          | 1  |
| 第一节 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 1  |
| 第二节 城市建设档案概念的形成           | 3  |
| 第二章 历代城市建设档案简述            | 7  |
| 第一节 古代城市建设文献和城建档案遗存       | 7  |
| 第二节 近现代城建档案               | 12 |
| 第三节 古近代城建档案特点分析           | 14 |
| 第三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城建档案工作    | 18 |
| 第一节 建国前城建档案的收集与整理         | 18 |
| 第二节 城市建设技术资料工作            | 19 |
| 第四章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城建档案工作       | 23 |
| 第一节 城市基本建设档案工作的创建         | 23 |
| 第二节 城市基本建设档案工作的初步发展       | 28 |
| 第三节 “文化大革命”对城建档案工作的冲击与影响  | 32 |
| 第五章 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城建档案工作      | 33 |
| 第一节 城建档案工作的恢复整顿           | 33 |
| 第二节 城建档案馆的建立与城建档案事业的振兴    | 37 |
| 第三节 加快发展,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城建档案工作 | 53 |
| 城市建设档案工作大事记               | 77 |



# 第一章 城市的演进与城市建设档案

## 第一节 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 一、从原始聚落到城堡聚落

城市是人类原始聚落经过数千年演进的结果,是社会进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公元前 6000 年前后,我国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由于农业已从渔猎狩猎中分离出来,使人类的定居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最原始的聚落。到了新石器时代的后期,大约在公元前 2500 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业剩余产品增多,手工业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一小部分部落首领集中了较多的财富,成为贵族阶层。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使得部落内部和部落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激化,部落间的兼并与战争促使强势部落或部落联盟的产生,从而促成作为防御工事的城堡的出现和贵族阶层拥有统治权力的国家机器的诞生,使我国社会的发展进入由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历史阶段。

1979~1980 年在河南淮阳县发掘的平粮台遗址,就是一处龙山文化晚期具有代表性的城堡式聚落。遗址总面积约 5 万平方米,城内居住面积约 3.4 万平方米。遗址已发现的建筑有:现存城墙长、宽各 185 米,平面呈正方形,高 3 米多,下部宽约 13 米,顶部宽 8~10 米,采用比较先进的小版筑技术。两座城门坐落在南、北城墙中央,位于城堡中轴线上,南门两侧有门卫房,南北城门有土路相连。城内还有十几座地面和高台建筑基址与多处陶制排水管、陶窑、墓葬等。

平粮台遗址和在我国多处发掘的龙山文化晚期城堡聚落遗址,虽规模较小,功能单一,内部布局也比较简单,但它们却标志着我国早期城市的出现已经为期不远。

### 二、早期城市的形成

公元前 2100 年前后,夏王朝建立,我国开始进入奴隶制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夏代已开始使用青铜工具,农业、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贝币”开始出现,已有“夏鲧作城”之说。到了商代,青铜器的冶炼达到相当水平,已存在较为固定的产品交易市场,“文字”作为一种记载符号已经出现,“城”的建筑已初具规模。继商之后的周代,铁器已经开始使用,农业、手工业得到较快发展,商品交换进一步扩大,文献上已有“前朝后市”的记载。加之建筑技术的进步,西周出

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建设高潮。

自夏至周,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奴隶制社会下“城”的建设一直处于不断的演变之中。到了西周,由于“城”内人口进一步聚集,“城”的经济功能逐步增强,“城”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宫殿建筑已具相当规模,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城市”已经显露。

在我国早期城市的考古发掘中,先后有河南的偃师二里头、尸乡沟,郑州的商城,湖北的黄陂盘龙城,河南安阳的殷墟,陕西的岐周、丰邑、镐京,以及河南的洛邑等遗址。我们可以从安阳殷墟的规划建设情况了解我国早期城市的一般状况。

殷墟遗址位于河南安阳市西北部,横跨洹河南北两岸,是商代后期的一座王都。遗址比较集中的地区面积约 24 平方公里,至今未发现有城墙。它的中心部分是由东北两面利用洹河的自然弯曲,西南两面则挖掘宽 7~21 米、深 5~10 米大沟所围成的一座别具一格的“宫城”。据规划专家称,这可能是殷城采取开放型规划结构形制的结果。遗址以宫廷区为中心,外围环布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及洹河北岸的王陵区。宫廷区有 53 处建筑遗址,由宫室、宗庙和祭祀场所组成,仅宗庙建筑的范围就达 2 万平方米,包括 21 座建筑组成的建筑群,在基址下压有纵横交错的水沟。宫室的房屋多为矩形和凹形,单体面积最大的为 40 米×10 米,房屋结构为卵石柱础支撑的木构架、草屋顶。在王宫范围内还发现多处窖穴、灰坑和一些墓葬,其中一座圆形的窖穴出土 17047 甲骨文片,据考证可能是王宫的档案库。在手工业作坊内发现有青铜器、骨器、陶器等。由此可知,在商代后期,我国早期城市已经形成。

### 三、城市的产生与演进

学术界一般认为,我国于公元前 475 年,即春秋末期进入封建社会。到了战国,由于生产关系的变革、铁制农具的出现、耕作技术的改进,农业有了较快的发展。此时,手工业除保留官办的作坊外,民营与个体手工业也有一定发展,特别是冶铁和制盐业已成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品生产逐渐增长,商品交换日趋繁荣,市场不断扩大,过去专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宫市”,逐渐发展为规模较大,为各阶层服务的独立商业区。战国以后这种在“城”中兴起的商业区,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堡聚落乃至早期城市作为奴隶主政治城堡的性质,使其演变为封建社会的一方政治经济中心。至此,“城”与“市”的有机结合,一个兼具政治经济双重职能的“城市”也就应运而生。

齐国的都城临淄就是战国后期一座最宏大的中心城市,人口达 30 万。遗址位于今山东省淄博市。城市总体规划是以宫城为中心的分区规划结构形式,由大城(外廓)和小城(内廓)两部分组成。内城位于大城的西南角,面积约 15 平方公里,是城市的政治活动区,内有宗庙、寝宫、宫市等建筑。其中有两处高台建筑基址,据

说是桓公台和金銮殿。内城的南面有官府手工业作坊及其生产者的居住区。外廓面积约 60 平方公里,中部和东北部手工业分布广泛,是城市的经济活动区。区内有各种手工业作坊、公共商业区、居住区和墓葬区等功能分区。手工业作坊包括冶铁、冶铜、制骨等,其中冶铁作坊最多,有的作坊遗址面积达 40 万平方米。居民区内已出现由里坊组成的街区。据考古发现,临淄全城有城门遗址 11 座,其中外廓城门 6 座。城墙全部土筑,墙基 17~43 米,南北城墙外挖有宽 25~30 米、深 3 米的城壕,小城的城墙外也有壕。城墙随地形曲折多变,形制不规则。城内有 10 条干道遗迹,内城 3 条,外廓 7 条,按经纬涂制布局。干道与城门相连,是对应城门之间的通道,宽 8~20 米。城内有排水明渠,大城有一条南北干渠,长 2800 米,宽 30 米,深 3 米,北段有一支渠,内城也有一水渠,这些水渠均注入城外水系。

城市,是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我国城市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形成后,经历了 2000 多年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历程。北宋时,由于废除旧的市坊制,商业取得突破性进展,手工业、交通运输、科学技术、城市建筑均有大的发展。宋代以后,城市的经济、文化功能得到强化,城市作为多功能的中心地位得以发展和巩固。到了明清,尤其是清道光二十年(公元 1840 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的入侵,民族工业的兴起,促使外贸、金融、工商业、航运、建筑业得到较快发展,一部分通商口岸逐步转变为城市。这些工商业城市虽无古代传统的城墙,但它们却是真正意义上的地区中心。近代城市的发展,使城市出现了水厂、电厂、煤气厂等公用事业,城市道路、交通等市政设施得到相应发展。城市建设和城市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城市发展出现前所未有的局面。1978 年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数量迅速增加,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已迈上新的台阶,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在创建新的、更高层次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已经并将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

## 第二节 城市建设档案概念的形成

### 一、城市建设档案的产生

“城市建设档案”(简称城建档案)一词是 20 世纪 80 年代才被确立的一个概念,但并不等于我国古近代就不存在城建档案。恰恰相反,我国的城建档案源远流长,遗存也较为丰富,它是我国优秀城市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档案宝藏的重要内容。

城建档案是什么?简单地讲,它是城市建设活动的历史记录。从这个并不严

谨的定义可知,产生城建档案的必备条件应该有两个:一是要有城市建设活动,二是要有利于记录这些活动的文字和载体。

上节已述,我国的城市萌芽于夏代,形成于商周,成熟于春秋战国。西周时曾出现过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城市建设热潮。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封建生产关系进一步确立,商业和手工业较快发展,以诸子百家为代表的城市文化的兴起,这些因素又促成第二次城市建设热潮的到来。此时,城市规划在前朝的基础上又有创新,由于建筑技能的进步,城墙、城门、宗庙、宫殿、房屋、作坊等建筑,以及道路、排水等设施已达到相当的水平。

城市建设热潮的兴起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在客观上要求把那些日后需要记忆和传承的城市建设活动成果记录下来。在文字出现之前,信息的传递只能靠口传身授。直到夏代文字出现之后,才使得用文字记录城市建设活动成为可能。《史记·封禅书》就曾记载过,一名叫公玉带的济南人献给汉武帝一幅相当于夏代初期的明堂图。图上标有大殿、楼台、围墙、道路等,这显然是一幅相当于现代建筑总平面图的图样。如果我们认可司马迁这段记载的真实性,是不是可以推断我国的城建档案形成于夏代。夏代是我国古代城市的萌芽时期,此时用于记录活动的文字已经出现。从产生城建档案的客观条件分析,明堂图的存在是可能的。1977年在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的一块铜制“兆域图”,是我国现存的惟一一件古代建筑平面图,从制图的精确度可以推测,春秋末期,我国的城建档案的绘制已趋成熟。再如春秋末期齐国的工艺官书《考工记·匠人》就是一份总结和反映周代城市建设活动的重要史料。我们现在见到的《考工记》是西汉河间献王刘德将其补入《周礼》中已失传的《冬官》一篇,因此又可称为《周礼·冬官》。至于《考工记》是用什么文字写在何种载体上,后人已无法考证。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从它记载的内容和后人对周代城市的考古发掘相对照,《考工记·匠人》确系春秋末期遗存下来的一部重要城市规划建设规章,它应该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比较完整和系统的一份城建档案。

以上是从文字的出现和城市的形成来说明我国的城建档案可能起源于夏代,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第二次城市建设热潮的兴起,加之用于记录的金文已经取代甲骨文,记录城市建设活动的城建档案更趋成熟。但是,由于受到记录载体的限制(主要是刻写在青铜器上),当时产生的城建档案也只能是为数极少的“官书”。到了东汉后,由于纸张的出现,人们用于记录的材料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城建档案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形式、内容上也相应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二、城建档案概念的形成过程

有了城市,就必然有与之相应的城市建设。因为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功能的发挥,是在建设活动所创建的物质平台上展开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城市

建设基本上是一种承前启后、反映当时的物质与精神文明水平的创建活动,它要承接历史的优秀文化成果,又很自然地将建设中创建的新的物质成果用某种形式传递下去,为后人所了解和传承。城建档案正是在这种历史延续的客观需求中应运而生。

研究城建档案概念的形成,一定要了解我国文书档案演变的一般状况,同时还要了解城建档案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与文书档案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从整体与局部的联系上更好地去认识城建档案。据档案史专家研究认为,档案萌芽于原始社会后期,产生形成于阶级社会初期。也就是说,我国古代以记录公务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档案和档案工作,到了夏代已趋成熟。当时,国家的公务活动主要包括行政、宗教、军事、商业、手工业、建筑等方面的内容。为便于开展公务活动,国家在都城或王城建造了王宫、庙宇、城墙、壕沟、公共建筑、坊市等,城市建设既为公务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又成为公务活动的组成部分。由于古代城市规划和重要的建设工程均属官府行为,记录这些活动的一些公文也就作为公务档案的一部分被保存在官府所设置的档案机构内,也有一些由负责营造工程的官员自行保管。如汉代的石渠阁、兰台、东观就是汉代中央档案典籍库,库内所藏“图籍秘书”,多为公务活动产生的档案,其中就有一些地图和建筑图。前面我们提到的《史记·封禅书》,说明身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在编纂史记时,已经查阅过“石室金匱”里的档案,否则他怎么会知道有幅明堂图呢?正是这幅图和有关记录,使汉武帝得以重建明堂。至于具体的工程施工管理,从汉代出土的骨签档案可知,当时“工官”负责工程管理,并负责保管施工档案。这说明,古代的城建档案从开始形成时起,就是国家公务档案的一部分,与反映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公务档案相比,它的数量很少,因此客观上不可能划分为一个独立的档案门类,同样,在理论上也不可能形成一个独立的概念。

到了近现代,由于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城市规模逐步扩大,城市建设的项目和内容日渐繁多,城建档案的数量迅速增长,加之档案的载体和形式发生了巨大变革,档案的范围和内容也更加丰富。有的部门或单位,由于档案数量较大,开始设置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其产生的专业档案。如清朝内务府造办处下设的舆图房,既是图样档案的管理机构,同时也是图样档案的专用库房,房内集中保存清政府和前朝遗留下来的地图和工程图纸等图样档案。民国时期,更多的专业部门和单位开始建立本专业科技文件的管理制度和规定,并由经办部门或人员保管所形成的文件材料。如各地管理城市规划建设的工务局,一般在其秘书处下配置专人,有的还设立档案室,负责管理该局形成和积累的文书档案和专业技术档案。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完成,从1953年开始,国家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城市建设在改造原有城市的基础上,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在新建工业城市兴建一批大中型工矿企业,以及各地对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改扩建过程中,

产生了大量的城市规划和基本建设方面的技术档案和资料。鉴于技术档案资料大量产生,亟待加强管理的形势,1959年底,国家档案局在大连召开全国技术档案工作现场会。会议提出:“对重要的城市和矿区的基建档案,要进行普查,集中统一管理”。1961年1月,国务院在转发国家档案局《关于加强城市基本建设档案的意见》中,对基本建设档案是这样定义的:“城市基本建设档案是城市建筑物、构筑物、地上和地下管线等各项基本建设的真实记录 and 实际反映。”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的城市建设档案的概念,它虽不够准确和完整,但对日后城建档案概念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在各地普遍建立城建档案管理机构,制定和完善城建档案管理规章的基础上,国家建设主管部门和国家档案局于1987年11月联合颁发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暂行规定》中,将城建档案定义为“城建档案是指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管理中形成的应当归档保存的文字、图表、声像等各种载体的文件材料。”可以看出,《暂行规定》给城建档案所下的定义,已经跳出基本建设档案的范围,以整个城市为对象,用城市规划、建设及其管理取代了原定义中的基本建设,使城建档案在内涵和外延上更准确、更科学。1997年12月,建设部第八次常务会议通过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进一步完善了《暂行规定》提出的概念,使其成为指导全国城建档案工作健康发展的理论依据。应该指出,在讨论和定义“城建档案”概念时,各地还提出其他一些版本,但与《暂行规定》提出的定义并无本质差别。当然,随着21世纪城市规划理念的不断更新,城市建设重点向“生态城市”的转移,以及城市管理的观念、方法和手段的进一步完善和创新,城建档案的范围和内容也必将随之发生变化,但它的根本属性和基本概念是不会有太大改变的。

## 第二章 历代城市建设档案简述

### 第一节 古代城市建设文献和城建档案遗存

#### 一、有关先秦时期的文献与档案遗存

大约在公元前 11 世纪,周武王灭纣,建立了西周。之后,由于实行严格的礼制制度,周王朝的权力更为集中,国力也日显强盛。在成康年代,周朝掀起了以营建王城洛邑(今洛阳)为先导的我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为了指导都邑建设活动,还订立了一套营国制度,洛邑就是在营国制度的指导下建设起来的。史料还记载,西周在建筑技术上已有很大进步,板瓦、筒瓦和脊瓦的出现,解决了屋面防水问题。此时洛邑城内的宫室、宗庙等建筑群已具规模。《考工记·匠人》正是为这次建设高潮而制定的营国制度的一部分,是一份十分珍贵、以规划和建设规章为主要内容的城建档案。

《考工记》系《周礼》的一部分,书中记载了六门工艺,三十个工种的技术规则,其中“攻木之工”部分有“匠人”一节。《考工记·匠人》的内容主要有两个部分:1. 规定“匠人”的职责,一是“建国”,即给都城选择位置,测量方位,确定高程;二是营国,即规划都城,设计王宫、明堂、宗庙、道路;三是“为沟洫”,即规划井田,设计水利工程、仓库及有关附属建筑。2. 制定规划与建筑规制,即规定都城、王宫及道路规划中的具体技术要求,如都城规划必须“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100 亩)”。对明堂、墙、屋舍、仓库等施工工艺,也都作了具体的记述。《考工记·匠人》既是一部官制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规章,又是汇先秦规划与建筑之大成的重要典籍,对后世的城市规划与营造业的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先秦时期的建筑档案遗存已十分罕见,前章提到的战国中山王墓一号墓中出土的“兆域图”,是现今仅存的一件。该图作于长方形铜板上,主要由线划符号、数字注记、文字说明三部分组成,以示墓域范围、规划布局和建设方位。从图上“中山王律令”可知,当时对建造陵墓的各项尺寸要求极严,同时还规定“其一从,其一藏府”。也就是说,该图一件随葬,一件藏于府库。可见,当时对重要的工程图,已有多套异地保管意识。

此外,在《逸周书》、《左传》、《管子》、《老子》、《越绝书》、《齐乘》和《史记》等文献中,均记载有先秦时期城市规划建设内容的片段。尤其是《逸周书·作雒》,可谓是

一本记述营建洛邑的专篇,它对王城的宫室、社稷坛与朝门等建筑,都作了详细的叙述。

## 二、有关秦汉时期的文献与档案遗存

战国末期,由于秦采取残酷的兼并政策,至统一六国时,除秦都咸阳外,大部分城市遭到严重破坏,导致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倒退。汉定天下后,汉高祖在其“凡城皆县”的命令下,城市建设有了起色,尤其是在秦兴乐宫的基础上兴建新都长安,后不断扩建,至汉武帝时又大兴土木,经过前后一百多年的建设,长安城成为具有庞大坚固的城垣,整齐宽阔的街道,规模恢弘、交通便利、市肆繁荣的帝都,它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城市之一。《三辅黄图》就是一部记载古城长安建设过程和情况的最早、最集中的文献。

据《三辅黄图》记载,当时的长安城墙“高三丈五尺(8.25米),下阔一丈五尺(3.53米),上阔九尺(2.12米)。雉高三坂,周围六十五里”,经考古工作者实测,长安城墙周长为25700米,与文献记述基本相符。在建造长安城墙时,文献留下了从西汉惠帝三年至五年(公元前191~前189年),三次征用民工31.1万人次的记录。对于宫殿建筑群的殿阁数量与名称,及其所用建筑材料,更是记叙详尽。

除《三辅黄图》外,记载长安城市建设情况的还可散见于东汉班固的《西都赋》、张衡的《西京赋》,及《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

由于城市建设、赋税和战争的需要,地图很可能是最古老的城建档案。20世纪80年代后期,考古学家在水放马滩一号秦墓中发现了7幅在松木板上的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时的古地图。其中有表示居民点的行政建制的“政区图”,有描绘地形、地貌、河流、道路、关口位置的“地形图”。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三幅西汉初年的帛图,其中一幅为城邑图,即我们现在所称的城市平面图。该图绘有城垣的范围、城门堡、城楼、城区街道、宫殿建筑等。据测绘专家分析,这张城邑图很可能是一幅省级首府的平面图,它对研究古代城邑的形制、规划布局、城防设施和城垣、城堡、楼阁建筑艺术等都有很高的价值。由于这幅图是绘在缣帛上的,因而成为我国年代最悠久的仅存的古代帛制城市平面图,实为古代城建档案不可多得的珍品。

## 三、有关隋唐时期的文献与档案遗存

隋唐时期是我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尤其是唐代前期,城市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此时城市数量不断增加,出现了15个人口超过10万户以上的城市,其中长安、洛阳两城市的规模尤为宏伟。

隋文帝统一中国后,于公元582年,在汉长安城东南营建新都大兴城,唐代在隋大兴城的基础上继续扩建,前后经历了72年(公元582~654年),才完成长安的



筑城建设。

公元605年,隋炀帝在汉魏洛阳故城西营建东都,同时,又大规模地开凿南北大运河,遂使洛阳成为南北水陆交通的漕运枢纽,经济地位十分重要。

隋唐时的长安和洛阳是当时全国最大的两座城市。据文献记载,长安城宏伟壮丽,人口近百万,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商业都会,还是国际交往中心,驻有多国使节和商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整齐、壮观和繁华的城市之一。记载隋唐长安和洛阳两座城市规划建设情况的有《隋书·高祖本纪》、《宇文恺传》、《隋书·炀帝本纪》、附于《隋书》的《明堂议表》、《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唐六典》、北宋《长安志》、南宋《雍录》、元《长安志图》、《资治通鉴·隋记》、清《唐两京城坊考》等,其中尤以《唐两京城坊考》的记载较为集中和具体。

需要指出的是,负责长安和洛阳两个城市的规划和建设的是我国古代著名的规划和建筑工程专家宇文恺,他原是将作大匠,后升任工部尚书,主持兴建两座都城及宫殿衙署,以及隋的宗庙、离宫和陵墓等重大工程。他还撰写过一些有关建筑的著作,其中只有《明堂议表》流传后世。根据《明堂议表》可知,宇文恺考证了隋以前的明堂形制,提出建造明堂的设计方案和依据,并且附有按百分之一的比例尺绘制的平面图和模型。当时,重大建筑物在施工前先制图已是通制,而按严格比例制作模型并写出设计依据的说明书则是宇文恺的贡献。

#### 四、有关宋元时期的文献与档案遗存

公元960年,宋朝建立,从而结束了唐朝后期至五代十国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两宋时期,在我国城市发展和城市建设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此时,全国10万户以上的城市由唐代的15座增至40座,由于废除坊市制,商业、手工业十分活跃,“城市”才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进步与发展。

由于宋代手工业的发展,建筑材料多样化,建筑技术的精巧,使得建筑构件的标准化在唐代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营造法式》、《木经》、《筑城法式》和《梓人遗制》、《大元仓库记》等建筑文献正是对汉唐以来,尤其是北宋时期建筑设计和施工经验的全面总结和规范,对研究古代城市建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营造法式》是我国现存时代最早、内容最丰富的建筑典籍,由北宋将作少监李诫奉令编修,全书34卷,内容包括五个部分:一是“序”、“劄子”和“看详”,相当于书的前言;二是“总释”、“总例”两卷,主要是注释各种建筑和构件的名称;三是各作制度十三卷,详细记述了壕寨、石、大木、小木等十三个工种的标准做法,完整地总结了建筑设计和施工中的“模数制”;四是“功限”、“料例”十三卷,规定了各种工程制作和安装的工作量,及使用材料的限量;五是各种工程图样六卷,包括平面、剖面、立面和大样等。

宋元时期,由于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我国城市除北方的开封、大都(北京)外,